

“习总书记在生活上跟基层干部没啥区别”

——习近平在正定



采访对象：崔时欣，1943年生。1974年到正定县委办公室资料组工作。1996年提前退休。

采访组：本报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4月17日

采访地点：正定县崔时欣家中

采访组：崔时欣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1982年刚来正定县的时候，您是最早见到他的工作人员之一，请您讲一讲当时的情景。

崔时欣：习总书记是1982年春天到的正定县。当时，我们新建的县委办公楼正在施工，还没盖好，县委还在一排老旧的平房办公。那排平房一共7间，第一间是值班室，后面6间是办公室，供县领导办公用。

那天，我正好在县委办公室值班，习总书记坐的车开进院里来，我是第一个见到他的。车一停，一位省委办公厅的同志和习总书记就下车了。我一看，习总书记穿着挺旧的一件衣服，但人很年轻，很精神。

省委的同志问我：“书记在吗？”我说：“在呢，你们先进屋坐一会儿，我去叫冯书记。”

冯国强书记在那排平房的最西头办公，我就把他叫出来了。

冯书记跟他们见了面，谈了一会儿话，随后就找到我，跟我安排说：“习近平同志到咱们县来当县委副书记，你给腾出一间房子来让他办公吧！”

我就在那一排平房当中找了一间闲置的屋子，帮他收拾。那个房间里有一张床，一个黄色的木质办公桌。因为这间办公室长期没人用，里边都是尘土。我把习总书记的行李从车上搬下来，屋里收拾干净，东西都放好。这个过程中，习总书记也一直没闲着，和我们一起干。收拾好了，屋里利落多了：一张床，一个桌子，一个书橱，还有脸盆、暖壶啥的。随后，我又给他找来两把椅子。这样，如果办公的时候有人来访，三两个人也能坐得下了。

采访组：您和县委的同志当时知道他父亲是习仲勋同志吗？

崔时欣：一开始并不知道。后来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们县委的同志有了一些传言，说习总书记是中央一个大官的儿子，来正定之前是在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当时我就有点搞不清楚：中央领导里面，姓习的我只知道习仲勋同志，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副国级的大干部。

时间长了，跟习总书记熟了，我上看下看左看右看，怎么看他都不像个高干子弟。他跟我们普通工作人员关系都特别融洽，我们大多都抽烟，他抽烟不多，但平时看文件或者谈事情的时候也抽。有的时候，一起开会或者谈事情，他拿出烟来，经常分给大家抽。有时候他自己没烟了，也管我们要：“老崔，来根烟！”

我们那时候都抽特别便宜的烟，一开始还不好意思给他。我说：“我这烟‘不呛’，你抽得惯吗？”那时候烟厂的工艺落后，人们抽烟也不讲究，认为烟“有劲儿”，味道足，呛嗓子的抽起来过瘾，就算是好烟。便宜的烟就“不呛”。习总书记从来不挑，他说：“我平时也

是抽这个，‘不呛’我也抽。”

我就想，高干子弟能抽这烟吗？他们怎么也得抽“中华”吧？习总书记跟我们抽这种几毛钱一包的烟，他能是高干子弟吗？我慢慢觉得，他应该不是什么大官的儿子，在生活上跟我们老百姓，跟我们基层干部，没啥区别。

我们县委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有一次，我们工作之余在办公室看电视，正好新闻上有中央一个会议的报道，习仲勋同志出现在画面上了。

我们的副县长就问习总书记：“老爷子身体怎么样？”

习总书记笑而不答。旁边的赵建军同志直接问：“习总书记，人们都说你是习老的儿子，你到底是不是？”习总书记笑笑说：“这个事，我不否认。”

这一下，大家都就知道了，原来习总书记就是习仲勋同志的儿子。但从那以后，我们县委的普通工作人员非但没有因此和他疏远，反而关系更亲近了，而且亲近当中还更佩服他了：你看，人家一个副国级领导人的孩子，从中央国家机关下到我们小县城，工作那么兢兢业业，和我们普通人的关系这么好，生活这么简朴，真不愧是老革命的后代。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艰苦朴素的作风当年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请您从衣、食、住、行几个方面谈一谈。

崔时欣：先说说他穿的衣服吧。习总书记在正定期间，平时穿的最多的就是一件绿色的旧军装。他稍微“像样”一点的衣服，就是一件灰色的西装，也挺旧的，平时很少穿。有时候他回北京探亲，也会换件衣服。他平时很少戴帽子，冬天冷或春秋刮大风的时候，戴一顶很平常的军便帽。至于裤子和鞋，也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可以说，习总书记穿的戴的，没有一件是“高级货”，他什么时候都是和我们老百姓一样的穿着打扮。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平时吃饭都吃什么？都在县委食堂吃吗？食堂的伙食怎么样？

崔时欣：我们县委和政府分开办公以后，食堂也分成了两个，但相距不过100米，不仅浪费地方，人工、燃料、食材都造成不小的浪费。所以没过多长时间，县委和县政府协商了一下，还是把食堂合并在一起了。

习总书记基本上一日三餐都靠这个食堂来解决，所以他每顿饭必须要在食堂开伙的时候来吃，否则就只能饿肚子了。他刚来的时候，为了熟悉情况，每天骑自行车奔波于各个乡镇，有时候下午回来晚了，到食堂去，赶上饭点了，就能吃口热乎饭，错过饭点了，饿肚子也是常有的事。有一次，我正好也有些事拖住了，来食堂也比较晚，所幸还有温乎的馒头和菜。等我快吃完的时候，习总书记才刚从乡下赶回来，那个时候，食堂还剩一点菜，馒头也沓

底凉了，也没有汤了。

我说：“习总书记，你咋才回来？都没啥吃的了。”

他说：“是啊，回来晚了。”习总书记打了一个菜和两个馒头，都是凉的，就坐在那儿吃了起来。

我说：“习总书记，我给你弄点热乎汤吧。”

结果我一看，汤也没有了。习总书记说：“没事，这有热水，我自己做个汤。”然后，他倒了一大碗热水，往里面放了一点点酱油，就做成了一碗“汤”。

我说：“习总书记，你可真能将就！”

习总书记经常下乡，所以他总是吃不上热乎饭，有时候还要饿肚子。一次两次的还没啥，时间长了他就得了胃病，还住了院。后来县委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给他弄了个煤油炉，还有一口小锅，吃不上饭的时候，张银耀就可以给他煮个挂面，卧个鸡蛋，有时候他自己也煮挂面。

有一次，我跟他闲聊说：“习总书记，你怎么成天光吃挂面呀？你也弄点别的吃嘛！”

他毫不在意地说：“咳，没事儿！随便吃点儿，不饿就得了。”他这话带着浓重的北京口音，我听着觉得特别好玩，印象很深，至今好像还在耳边。

有一年，县委和县政府联合搞了一个“小灶”，其实就是腾出一间空房，摆上桌子椅子，让领导们在屋里吃饭，让服务员把饭菜给他们端过来。习总书记去了一次，吃了一顿，后来就再也没去，以后还都在食堂吃，拿饭票和大家一起排队。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去“小灶”吃了，他也没说啥“不搞特殊化”之类的道理，只是淡淡地说：“咱们都是一起工作的同志，我为什么非要到那儿去吃。”

有时候他下乡调研，中午赶不回来，就在乡镇吃饭，去近的乡镇都是骑自行车，去比较远的会坐县里的吉普车。有一次，司机跟我说了这样一件事。

他开车拉着习总书记去一个比较远的乡镇调研，中午在那里吃饭，桌子摆好以后，乡领导给上了好几个“硬菜”，很丰盛地摆了一桌子。习总书记就说：“怎么搞这个？不要搞这个，我吃顿便饭就行了。”乡干部说：“习总书记，给你都准备好了，你就吃吧。”习总书记说：“不行，不能搞这个，我就吃家常便饭。”

有了习总书记的以身作则，“下乡吃饭要节俭”，在正定县领导班子里慢慢就形成了共识和习惯。以后县领导到乡镇视察、调研，都和习总书记一样，在乡镇食堂吃便饭，或者到老百姓家里吃派饭，一律交钱、交粮票。和群众吃一样的饭，不搞特殊化，该给钱就给钱。

习总书记来正定工作后，他北京的朋友经常过来看他。他们来了，习总书记很少到招待所请他们吃饭，即使有也都是自己掏钱。大多数时

候，他都是买几个罐头和菜在他办公室招待这些朋友。如果赶上周末，还会和朋友喝两杯酒。那时候的菜也便宜，十来块钱能买四五个菜，虽然没有多高级，但也挺可口，还挺不错。有的时候，他朋友来了，他就上食堂打两个菜，但肯定也会自掏腰包。

有一次，习总书记北京的朋友来看他，他就让服务员去一家回民饭店买牛蹄筋。过了一会儿，服务员买回来了牛蹄筋，是切的大块，用塑料袋装的。习总书记跟服务员说：“你下次再去这家饭店，给他们提点儿建议，这牛蹄筋吃着挺好，但是切成大块，顾客吃着不方便，要是切得薄一点，顾客吃着就会方便一些。还有，牛蹄筋可以炒，可以烩，做的花样多一点，价钱也能卖上去。”后来，这家回民饭店的牛蹄筋果然有了更多做法，现在还能吃到他们炒的和烩的牛蹄筋，味道很好。

习总书记回北京探亲，带的东西通常有两样，一样是我们正定的缸炉烧饼，还有一样是卤鸡，他家里人都很爱吃，习老也夸赞说真好吃。习总书记也给卖这两样东西的饭店提建议：“你们做得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不去北京开店？”他们后来去没去，我不太清楚，但习总书记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中总是这样，心里总是想着老百姓，想着让他们的生意做得更好，开拓更大的市场，挣更多的钱。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期间，是一直住在县委办公室里吗？

崔时欣：是的。习总书记刚来正定的时候，就住在他们给他收拾出来的那间屋里，后来县委办公楼盖好了，他的家具几乎也没有什么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一个书橱变成两个书橱了。他屋里什么现代化的办公设备都没有，电话也没有，当时我们县委就办公室和组织部各有一台摇把电话，县领导都没有独立的电话。

习总书记住的地方，也就是他办公的地方。他为了提神，每天都喝浓茶。服务员一天给他打一壶热水，但有的时候，我看习总书记早上自己去水房打水。我就跟服务员说：“打水是你工作，哪能叫书记自己打水去？”服务员说：“有时候我们还没上班呢，书记就自己去打水了。”

还有一次，习总书记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按照类别一叠一叠分开摆放好，准备分开处理。结果服务员进去给他收拾房间，把文件全都摞在一起，整整齐齐码起来。习总书记回到办公室一看，沮丧地说：“得，我白忙活了。”服务员吃了一惊，说：“对不起啊，习总书记。”习总书记一点也没生气，对服务员和气地说：“没关系，你也不知道嘛。以后文件就不用收拾了，擦擦桌子就行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时经常下乡调研，请您谈谈他出行方面的情况。

崔时欣：习总书记刚来时，我们县委就一辆吉普车。领导又多，这个上这儿，那个上那儿，车根本不够用，没办法就跟别的单位借车，但是各局办的车也少。习总书记平时都是骑一辆挺旧的二八自行车下乡，除非去远的地方，他才会偶尔坐一下汽车。有一次，习总书记坐车到一个比较远的乡镇调研，结果车坏在半道了。我跟习总书记说：“咱再买一辆车吧，现在就一辆，不够大家用的。”习总书记说：“不要太浪费，有一辆车，只要不耽误要紧事就行了，反正我大部分时间都骑自行车。”

后来，习总书记想了个办法：可以在北京买那种旧车，修好了，开回来我们用。习总书记的意思是，不管老的还是新的，能跑、有车用就行了。我们派人去北京，找了两辆看着还不错

的车，检查它有什么问题，再用其他车能用的零件给它换上，最后修好了，开了回来。

这两台车看着都快报废了，不能正常使用，但到了我们手里，拾掇好了，又开了很多年，发挥了很大作用。后来，习总书记把这两辆车奖励给了下面发展好的两个乡镇。

采访组：衣、食、住、行都谈完了，请您再谈谈他平时的工作吧。我们听说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期间工作非常繁忙，经常熬夜，具体情况请您讲一讲。

崔时欣：在工作方面，习总书记一向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对别人则是尽量多加体谅。每天吃完晚饭，他就到我们办公室来看看电视，看完新闻，就回去批阅文件，他每天要批阅的文件特别多。上班时间弄不完，下班以后至少还要弄三四个小时，多的时候批到半夜也是经常的事。

习总书记任县委书记后，要批的文件就更多了。大部分文件基本都会过我的手，所以我知道这个工作量有多大。我的工作内容是，先大致浏览内容，看是需要哪个部门去办的，就给分管领导和相关部門各发一份，比如涉及公安的，就有公安一份。光干这个活，我铆足了劲干，一天至少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完成，何况习总书记还要一份一份仔细看，还要思考，考虑好了还要批意见。意见有的在文件上直接批，有的写的比较长，文件上写不下还要另附纸。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白天的时间，习总书记有时候下乡调研，有时候和他请来的专家、顾问谈事情。最耗费时间和精力，就是接待上访的群众，习总书记总是耐心地去了解上访群众的问题，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或者劝解他们。有的人觉得“打发”上访群众特别费事，但是习总书记从来不是“打发”而是真给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习总书记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很晚。每天的文件不批完，他是不会睡觉的。事情如果拖着，他也睡不好觉。但他对我们普通工作人员倒是非常关心，经常嘱咐我们要注意休息。

有时候到了晚上，我们在加班，他在办公室工作累了，出来转一圈，看见我们的办公室亮着灯，忙着做事，他就说：“你们别太累了，早点休息吧。不要看我这儿亮着灯，你们就不走，该休息就休息。”转了一圈，他回去还继续工作。

除了批阅文件，他从外地请来的顾问、专家、各方面的人才，也经常和他“秉烛夜谈”。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1985年曾作为县委书记到美国考察，他有没有和您谈起过到美国的见闻、经历？

崔时欣：1985年，习总书记去美国考察回来后跟我聊天说，他在美国找了一些留学生，和他们开座谈会，座谈会实际上也是比较轻松的谈心。他问留学生：“你们毕业以后打算怎么办？”对这个问题，怎么回答的都有。有的学生表示：“中国现在改革开放了，需要人才，大学毕业以后，有回国的打算。”还有的学生说：“目前还没考虑好，会根据自己专业在哪里有更好的前景来决定。”但还有学生说：“美国给我提供了助学金，毕业以后，我得为美国人民服务！”

我说：“那您是怎么跟他们说的？”习总书记说：“我就跟这些学生讲道理。我说，‘你是中国人，你父母也是中国人，你为啥不为中国服务呢？有可能你有签好的工作合同约定，3年、5年，那你就按照合同办事。但是合同到期了，请一定回到祖国去，为人民服务！’”

坚持和全面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这是金融发展和防控风险的政治保障。要牢固树立党管金融思想，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战略定力。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和“运筹帷幄以决胜千里之外”的气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建好金融系统领导班子。金融系统各级领导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强化责任担当，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对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以整治金融乱象为抓手，切实回归实体经济本源，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同时，要努力建设一支政治过硬、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为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凝聚智慧和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上接1版）

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最需要监管的领域。要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强化金融监管为重点，着力解决金融乱象丛生、监管法治缺位以及监管统筹协调等问题，着力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坚决治理金融乱象，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要时刻保持高压态势，摒弃监管“父爱主义”，严肃监管氛围，清理退出非法金融机构，实行牌照经营，进一步明确设定评估、检查、督察和整改环节，依法进行处罚，提升监管威慑力，令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隐患无所遁形。

二是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和健全金融法治。要严格规范交叉性金融产品，继续拆解影子银行，健全对金融控股集团以及股东的监管，重点整治乱办金融、乱搞同业、乱加杠杆、乱做表外、违法违规套利等严重干扰金融

市场秩序的行为。要及时出台以资管新规为代表的监管规章，消除监管空白与监管套利，通过强化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和穿透性，实现所有金融活动监管全覆盖。强化金融科技与监管科技等创新技术的应用实践，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丰富监管手段，弥补薄弱环节与现有短板。全面协调推进依法治国，健全金融法治，以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金融监管法律体系、金融风险管控体系和金融机构合规体系为主要着力点，防范金融风险，保障经济与金融良性循环。

三是加强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职能。近年来，金融风险与金融乱象的累积与暴露，与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不完善、监管职责不清、重复监管与监管空白等体制性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首要任务是统筹中国金融监管体系调整，明确监管机构定位，落实工作重点与监管职责，并强化监管问责。协调金融政策与相关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提高政府宏观调控效率，做好国际国内风险应对。重点关注影子银行、资产管理行业、互联网金融以及金

融控股公司，发挥金稳会与“一行三会”的监管合力。同时，要健全人民银行宏观审慎与系统性风险监管职责，与微观审慎监管共同推进，做到“既见树木，也见森林”。

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激发市场活力

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解决影响和制约金融业发展的难题必须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创新措施。

针对深化金融改革的一些重点问题与重要方面，要加强系统研究，完善实施方案。具体而言：要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制定金融监管问责办法，形成有风险没有及时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风险没有及时提示和处置就是渎职的严肃监管氛围；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以金融力量支持国家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促进金融业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研究设立国家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坚持住房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

度，避免金融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风险交叉传染和相互叠加；有序放宽市场准入，推动人民币与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落实金融业开放举措，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引进国内外先进实践经验，积极引入有效竞争，破除旧有桎梏，激发市场活力；强化各类金融机构股权管理和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内部风险控制，以更健全的管理机制应对更包容的开放。

当前要充分认识到，金融创新的主要目标不是规避监管，是要如何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金融需要和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坚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思维理念、体制机制和科学技术等各项创新来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促进经济与金融血脉相依、共享发展。金融创新要扎根于为实体经济服务，适应消费者和投资者需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要坚决打击脱离实体经济需要、规避监管的乱“创新”，从源头管控新兴金融风险点，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长远和根本利益。